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The Double Witness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文学与历史的  
双重见证

王尧等 / 著

中國華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学与历史的双重见证 / 王尧等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7-80222-787-3

I. 文… II. 王… III. 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 206.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84110 号

### • 文学与历史的双重见证

---

著 者/王 尧 等

出 版 人/方 鸣

责任编辑/刘凤珍 李晓娟

装帧设计/孟 娜

版式设计/孟 娜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20×980 毫米 16/开 印张/17.5 字数/209 千字

印 刷/北京嘉恒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22-787-3

定 价/30.00 元

---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 20 号院 3 号楼 305 室 邮编: 100029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 (010) 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 (010) 64443051 传真: (010) 64439708

网 址: [www.oveaschin.com](http://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mailto:oveaschin@sina.com)

#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意识形态规约与文学演化	15
一、“人民的文学”的基本方向	16
二、“歌颂与暴露”的立场平衡	22
三、出版传播的有效掌控	27
第二章 革命在人性与阶级性之间的沉浮	34
一、历史观与人性的碰撞	35
二、革命斗争在世俗生活的复杂反映	42
三、世俗幸福的流向与分配	55
第三章 《文艺报》与当代文艺思想的发生	61
一、接受的策略：此消彼长	61
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本土化	72
三、“双百方针”的转向	78
四、《文艺报》与文学制度的重建	88

五、社论的价值	96
<b>第四章 文本修改与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b>	<b>104</b>
一、《青春之歌》的修改与知识分子成长史	105
二、《创业史》的修改与农村题材创作	123
三、《欧阳海之歌》的修改与军人形象的重塑	140
<b>第五章 “爱武装”叙事中的性别与政治</b>	<b>149</b>
一、女性及其社会生活	149
二、女性处境及其人生信仰	158
三、女性形象及其文学叙事	171
<b>第六章 矛盾重重的“过渡状态”</b>	<b>186</b>
一、“简单中断”与“历史联系”	186
二、主流文学话语形成中的不同姿态	194
三、文本中的矛盾、冲突与转换	201
<b>第七章 新时期文学场域的重新生成</b>	<b>215</b>
一、人民话语再现文学场	215
二、文学期刊与新时期文学场域重建	224
三、“二为”方向与政治文化的变革	235
四、经典译文的修改与文艺政策重心转移	249

第八章 “革命叙事”的转换、扬弃与消解	257
一、“革命叙事”中的话语冲突	258
二、从“理想”到“生活”的转换	261
三、被重新理解的“革命”及其叙事	267
后 记	273

## 绪 论

### 一

在学科层面上讨论中国当代文学，应当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用“中国现当代文学”来命名一个学科，已经成为学界的习惯表达，也就是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否作为一个学科的部分已经没有很大的争议。同时，我们注意到，在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统一论述中，论述现代文学的文学史观、知识谱系与方法，并不能充分契合当代文学的历史。即使现在的学界已经重视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关联研究，但是，现有的关于整体论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著作，仍然不能解决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在文学史框架中的分裂现象，甚至是拼凑的现象。所以重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合法性，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应当是，在文学史的阶段关联中，突出当代文学的特殊性，形成研究当代文学的学理基础，并且把这样的研究与中国当代历史的复杂性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剥离出去。

从表象上看，在学科内部，研究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分工是明确的，虽然也有部分学者能够做“打通”式的研究并分别有所成就，可对多数学者来说，治现代文学还是当代文学则有侧重。这些年来，关于“新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和“新时期

文学”概念的辨析，都意识到历史阶段的差异性以及概念背后的复杂性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经历了重大的变化，在“拨乱反正”之后逐渐成熟并且基本稳定。这个变化后的成熟的研究范式是与80年代以来整个人文学科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而作为当代文学的写作与评论曾经在很长时期处于先锋状态，也就是说，现代文学学科的成熟是与当代文学的挫折、发展、困顿紧密相关的。如果做一个简单的、或许是偏颇的概括，现代文学研究基本上以自由主义为思想背景，以“纯文学”及“启蒙文学”为文学观的研究。这里，我无法也无力对这样一种研究的合理性及局限性做出充分的评价，我只是想说，当我们用这样的思想背景、文学观及方法论来观察和判断当代文学的历史及当下的写作时，当代文学的历史及当下思潮往往被简单处理了，当代文学自身的复杂性、丰富性及当代文学与当代史的复杂关系都被简单处理了。

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是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变革中发生、发展的，而当代文学不仅与当代史而且与当下生活有着更复杂的关系。如果说这两者之间的背景有什么差异的话，那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的不同；如果说这两者之间有什么相同的话，那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化”演变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过程。现在的当代文学史研究和早些年不一样，已经无须急于给当代文学作是否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界定，但是，当代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化”的密切联系仍然是需要我们着重考察、辨析的内容之一。改革开放的变化同样反映在“社会主义文化”的变化上，文化的多元化并没有改变文学仍然是在变化了的“社会主义文化”语境中发生发展的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在考察“十七年文学”、“文革”时期文学时，可能会比较多地注意到这个问题，实际上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文学制

度等，仍然处于“社会主义文化”的影响之下。当代文学的历史，在很长时期都是社会主义文化想象的一部分。

因此，政治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始终与中国当代文学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通常也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视为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问题之一。政治文化属于政治社会的精神范畴，它是一个社会关于政治体系和政治问题的态度、信念、情绪和价值的总体倾向，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的。一般看来，研究政治文化的特征可以作为研究政治的一个重要方法和途径。所以说，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与政治文化的关系，是中国当代文学史论述的一个重要内容。

当我们把“政治文化”这一概念引入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之后就会发现，“现代性”作为一个统一的概念，已经无法一以贯之在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历史中。在“现代性”的多副面孔之外，“社会主义现代性”是否成立，如果成立又怎样反应在当代文学历史中，又怎样影响我们对当代文学史的论述？如果不成立，“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时期文学是否就视为“现代性”的断裂，“新时期文学”则是“现代性”的部分复活？倘若如此，究竟在怎样的范围和多大的意义上将“现代性”介入到当代文学的研究之中。

另外一个问题则是现在已经有了充分讨论并且初步有了共识的“纯文学”观对文学史研究的影响。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文学批评中，“纯文学”观的提出，不仅影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而且也对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写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几乎是重新塑造了一代作家。这些年学界在反思“纯文学”观时，既肯定其提出的合理性，坚持抗拒“政治”对文学本体的伤害，同时又揭示了“去政治化”之后的局限及负面影响，这对我们充分认识和论述当代文学史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独特性是十分有益的。



## 二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中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段落。我们通常把这个时期看成是文学“回到自身”的阶段，而“回到自身”的一个最重要特征，就是文学重新处理了它与政治的关系。这一段历史，在近年来“重返80年代”的研究中有了新的呈现和解释，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围绕“去政治化”问题，重新阐释了中国当代文学与政治文化的关系。

如果把“重返80年代”视为近几年来的一个文化事件也许不会有什么争议。在知识界少有较大规模“集体行为”的情形下，2006年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甘阳主编的新版《八十年代文化意识》出版，给原本进行中的“重返80年代”工作推波助澜，一时呼声鹊起、应者云集，渐成思潮。但在短促爆发后又很快趋于平静，此情形和90年代以后的一些讨论、思潮和事件一样。这个时代已经长久没有那种相对耐心持久、饱满结实的思想收获期。当“重返80年代”的浪潮逐渐回落时，在学理和问题的层面上讨论“80年代”以及重返“80年代”也许更有意义。

在有了“思想解放运动”、“新启蒙”，“文化热”、“方法论热”和“小说革命”以后，“80年代”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时期之一。因此，无论是80年代行进中的及时评论，抑或80年代之后的不断阐释（种种阐释不能都视为“重返”），关于80年代的论述始终是当代文学界一个持续的话题。在80年代，文学、哲学、美学以及史学发挥了“先锋”的作用，这也是当年的一大特色。90年代以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已经迅速发展，但有明确“重返八十年代”意识的还是以人文学者居多，其中，文学研究界的重返已有不少

系统的成果问世。我们还注意到，在90年代末期，不少80年代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开始“重返80年代”。1999年岁末，韩少功的一篇谈话录《反思八十年代》触及的一些话题也是近两年来文学研究界“重返80年代”讨论到的关键问题，不少作家都不同程度对80年代的文学创作有所反思。相对于许多学科在“重返”中的缺席，文学界的写作者和研究者表现得更为活跃，“重返80年代文学”事实上是“重返80年代”这个事件中的主要部分。“重返80年代”这一巨大的任务显然不是文学界能够独立完成的，但文学的敏锐，恰恰又是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

“80年代”之所以成为我们思想生活和学术研究中的一个问题，并不只是在当代文学史论述中它已经成为一个“断代”，不只是在“80年代”发生过程中我们对“80年代”的解释便已存在分歧，甚至也不只是因为新的知识谱系为我们阐释“80年代”提供了新的可能，重要的是“80年代”所包含的问题是与之之前的历史和之后的现实相关联，这些问题生在80年代，却有“前世”和“今生”。在来龙去脉中“重返80年代”，既是一个研究方法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世界观”的确立。如果“重返80年代”只是“反思”和“再解读”80年代文学本身，那么这样的重返不仅局促而且也缺少洞察历史变革的宏阔视野和支点。因此，我以为需要尝试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论述中“重返80年代”。

和“80年代”相关联的一个概念是“新时期”。有争议的“新时期”曾被分割成“80年代”和“90年代”两部分，也有以“后新时期”终结“新时期”的命名。我想，我们可以暂时搁置这些概念的争议，就表述的内容来说，“80年代”作为“新时期”的一部分应当是没有疑问的。与“新时期”紧密关联的则是“文革”，当我们讨论80年代文学时，势必牵涉到“新时期文学”与“文革文学”的关

系问题，也无疑会连带到“十七年文学”。这一关联性的研究，也正是当代文学史论述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叙述和揭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讨论80年代文学的一个前提，也就是说，我们首先要关注“80年代文学”是如何发生的。90年代以后文学写作的变化以及文学批评的分歧，其实仍然没有能够避开“新时期”与“文革”相关联的若干重要问题，新世纪关于“纯文学”的争论，既是重返80年代文学，也是回到“文革”结束后文学的基本问题上。

我们通常是在否定的意义上阐释“新时期”与“文革”的关系的。在80年代以后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史论述中，“文革”始终是一个显现的或者潜在的参照系，因此而有“拨乱反正”，也是文学之所以被称为“新时期”的根据。于是，“80年代”作为文学史的“断代”意义也即彰显出来。这样的论述经由对“文革文学”的否定，在相当程度上将一些贯穿在“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和“新时期文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搁置起来，在我看来这是当代文学史论述中的一种“断裂”。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关于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关联研究，关于“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的关联研究，包括“新时期文学”与“五四文学”、“十七年文学”与“延安解放区文学”的关联研究，都有鲜明的意识而且富有成果。但是关于“文革”和“新时期”的关联研究却始终没有深入下去，因此，我曾提出一个问题：文学是如何从“文革”过渡到“新时期”的。另外一种方式，是从“文革”时期的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潮中挖掘积极的因素来论述“新时期”到来的必然性以及历史断裂中的进步力量。比如，对“极左”思潮的抵制和反抗，包括“朦胧诗”在内的“地下文学”或者“潜在写作”等都在文学史的论述中获得了积极的评价，这些论述虽然未必都是着眼于我所说的“关联”研究，但多少弥补了当代文学史论述中的“断裂”

因此，在我们的视野和叙述中，80年代文学的“新”是和此前的文学表现出截然相反的路径，用南帆的话说，“人道主义、主体、自我、内心生活是文学理论撤出激进主义革命话语的通道。”这条通道如果用简单的概念来加以描述，那就是“纯文学”，“纯文学”集纳了80年代文学的最基本方面。在今天的种种当代文学史中，关于80年代文学的论述虽然不尽相同，但从“纯文学”的概念出发选择和评价80年代文学是相同的尺度。因此，对“纯文学”的反思，实际上即是对80年代文学及前后相关问题的反思。围绕“纯文学”，我们可以牵扯出更多相关、类似的概念：人性、个人主义、形式、新启蒙、现代派、先锋、寻根、知识分子、精英等。在这样的通道之中，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有许多我们过去耳熟能详并且是我们思想生活、审美活动中的许多概念和词语被搁置甚至被遗忘了：革命、阶级、世界观、社会主义文化、工农兵创作、样板戏、史诗等。这样的状况，事实上也包含了一种二元对立的结构：激进主义革命话语与纯文学。

在今天的语境和知识谱系中，我们已经发现了当年以及在后来一段时期里对80年代文学的处理过于简单了。纯文学的历史不仅不是80年代文学的全部，纯文学自身的复杂性也非文学史论述中的那样单纯；同样不可忽略的问题是，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们已经无法对80年代文学作贯穿到底的概括，而我们曾经认为已经解决了的问题或者因为纯文学的胜利而被搁置的一些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全球化”的背景下又重新抬头。发展的路径不同，但问题的基本面仍然在那里：政治、革命、社会主义文化、文学体制、阶级和阶层、世界观、宏大叙事、工农兵写作、知识分子与大众等又以旧貌新颜和我们遭遇。毫无疑问，80年代延续在90年代和新世纪之中，但这只能是笼统的说法。如果说“80年代文学”是共同的记忆，但不可否认，每个人的经验是有差异的，与其说我们仍然生

活在 80 年代，毋宁说我们生活在关于 80 年代的纪实与虚构之中。当我们和那些死而复生的问题再次遭遇时，我们不能不承认，80 年代和我们的想象并不一致。

### 三

巨大的落差在 90 年代的变化之中。张旭东在为《幻想的秩序》所作的自序《重返八十年代》一文，有比较多的篇幅是在谈“80 年代”与“90 年代”之关系。“‘80 年代’这个‘未完成的现代性规则’已成为‘后新时期’都市风景中无家可归的游魂。”因此他有一个“信念”：“90 年代学术思想不但是 80 年代‘文化讨论’的发展，更包含着一个文化思想史上的未完成时代的自我救赎罪。”这个理想的状态是：“如果 80 年代西学讨论为某种隐晦的‘当代中国文化意识’提供了一个话语空间，那么 90 年代中国文化批评的题中应有之义就是：通过对西方理论和意识形态话语的细致分析去破除思想氛围的幻想性和神话色彩，从而为当代中国问题的历史性出场及其理论分析提供批判意识和知识准备。”用这样的视角看，张旭东揭示了 80 年代到 90 年代的演变轨迹：“对新的思想空间的渴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人们下意识地赋予了那些新颖的符号、叙事、话语和意识形态表达以一种感官的丰富性和刺激性。换句话说，‘文革’后中国的社会欲望在寻找其象征的表达时发现了‘西方理论’，而这种‘欲望化的象征’的物质规定性和意识形态内容都要求将其自身以‘审美’方式重新创造出来。然而 80 年代文化热和西学热所带有的强烈的审美冲动和哲学色彩无法掩盖这样一个事实：‘文革’后中国思想生活追求的世俗化、非政治化、反理想主义、反英雄主义的现代性文化。这种世俗化过程及其文化形态在如今的‘小康社会’或‘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中获得了更贴切的表现。但在历史展开之前，其抽象性和朦胧性却找到其美学的本体论的形式。在这个意义上，80年代变成了90年代的感伤主义序幕，正如文化热暴露出一个反乌托邦时代本身的乌托邦冲动，标志着一个世俗化过程的神学阶段。”以“援西入中”的方法论来阐释80到90年代的变化，这是一个重要的角度，确实也与我们在80年代关于现代化的想象方式和内容比较吻合。如果承认到目前为止我们自己的文艺理论和批评武器大致来自于西方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用这段文字来解释90年代以来的文学何以会有这样的面貌：世俗化、反理想主义、反英雄主义、反宏大叙事等。

但是从80年代中后期经90年代再到新世纪，在知识分子与历史和现实所构成的复杂场景中，文学写作的复杂性已非一种理论和方法可以阐释。“纯文学”在后来的发展无论是自身还是它的语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已经失去了从严格角度来论述文学发展路线的可能。以写作实践而言，在文学一方面表现出世俗化、非政治化、反理想主义、反英雄主义等现代性文化特征的同时，精神性、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宏大叙事仍然作为80年代的一个传统延续下来，而处于“中间”状态的以及反映了后现代文化特征的创作也呈现了另外的面貌，从80年代过来的莫言、王安忆、韩少功、贾平凹、张承志、张炜等一批作家的创作都出现了一些异样的情况。对这些作家的评论已经不能按照80年代的“纯文学”的尺度来衡量，如果这样，一种批评的困窘就出现了：90年代以来我们对这些作家的批评常常停留在80年代的理解之中，而这些理解现在看来只能是我们观察和评价80年代文学的一种框架。

文学在90年代的变化其来有自。似乎在“新写实”的命名之后，我们就再也不可能统一地论述80年代文学了，这种状况其实在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

学”、“新写实主义”来叙述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文学时业已存在。在这样一个以时间为线索的现代性叙述中，80年代文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事实上已经被简单处理了。比如说，在这样的叙述中，汪曾祺的小说常常必须“单列”；高晓声“陈奂生系列”之外的小说就不被重视；如果只把韩少功、王安忆、贾平凹的小说归属到“寻根文学”，他们的非“寻根”创作也常常被忽略，等等。许多作家被剪裁了，许多在思潮之外的创作被批评界忽视了。在这样的序列中，“寻根文学”与“先锋文学”也被视为对立的思潮，这两种思潮在回应西方现代性时的复杂关系被简单化理解。

回溯80年代文学写作的路径，可以发现文学“方法论”的同一性和差异性始终是并存的。“援西入中”可以说是80年代作家的一个共同选择，具体到“先锋文学”和“寻根文学”思潮，其实不仅是“先锋文学”，“寻根文学”也与“现代主义”有密切的关系，以文学史论述“典型”的“寻根”作家韩少功的《爸爸爸》来说，我们不能否定这个小说是“现代派”。在既往的论述中，常常为了突出思潮的特征而舍弃了作家和文本的其他要义。“先锋文学”的往后退其实也是“方法论”的调整，而更多的包括“寻根”作家的创作早已开始了“方法论”的调整。这个调整，便是作家对中国传统叙事资源的重视。在创造性的方面认识本土资源的意义，在被我们贴上鲜明标签的作家如莫言、韩少功、贾平凹、格非、林白等人那里都有“革命”性的论述，特别是他们的一些作品给我们前后判若两人的印象，如《檀香刑》、《生死疲劳》、《马桥词典》、《暗示》、《秦腔》、《人面桃花》、《妇女闲聊录》等。

这似乎表明，“纯文学”的边界其实在80年代就远比我们现在的文学史论述更为广阔。而90年代以后“纯文学”边缘化的遭遇出乎我们的想象和预料，由此造成的落差让我们手脚忙乱失去了定律

“纯文学”在90年代以后的遭遇并非“纯文学”本身有多少致命伤，而且并未在80年代的基础上往后倒退，相反，呈现了汉语写作的新的可能性，只是因为它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发生了变化，它的价值并未边缘化。在这个变化中，“纯文学”的部分“虚假影响”开始消失（我认为我们应当承认文学在80年代的影响有些是虚假的），同时作家和批评家也还没有能够找到和现实相对应的方式。在文学的“乱花”之中，“纯文学”之外的创作也挤压“纯文学”，文坛因此纷扰。当我们以“纯文学”的标准对待其他创作时，其态度颇有点像新文学时期对待“通俗文学”一样。所以，我们在坚持“纯文学”的基本价值并且也“与时俱进”时，可能需要以“大文学史”观来看待文学的格局。

#### 四

如果顺着前面张旭东所描述的那个轨迹，我们可以认为，90年代以后的“世俗化”过程是80年代现代化想象展开后的必然。这已是我们今天不得不承认的一条历史轨迹。当然，在知识界同样有人士对80年代的理解着重在理想主义而不是社会欲望方面，因此在不得不承认这个现实时，又将如何对待“市场”、“世俗化”、“大众”等问题作为考验知识分子品格的关键。当年，知识分子对计划经济的挣脱对市场经济的向往，是与“新启蒙”和“纯文学”的核心价值相吻合的，通常把市场视为自我实现、民主自由的“归宿”。那时对市场经济的想象和向往忽略了市场经济作为一种体制给人带来的负面影响。消费主义等新意识形态将不仅世俗地解释了知识分子倡导和坚守的那些精神准则，而且彻底冲击了知识分子在80年代现代化想象中确立的身份和话语权以及知识分子话语曾经具有的普遍意义。90年



代人文精神的提出和讨论就是在这一直接背景下产生的。

在这样一个大的变化的情况下，知识分子“批判的话语文化”遭到挑战，知识分子处理现实问题的能力也遭到挑战，部分知识分子甚至改弦更张，而“纯文学”的处境和演变、作家的困惑与选择也只是这个大格局中的一种。这一状况是否只是因为“市场”和“新意识形态”的冲击？是否只是因为有了“市场”和“新意识形态”，我们才会发出“知识分子都跑到哪里去”的感叹？我想，这是我们以80年代文学为中心在整体上论述当代文学史时必须考虑到的问题。

在我们曾经有过的思想共同体中，“新启蒙”和“纯文学”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专制主义而产生的，这是80年代许多思想和设计的基本背景，也是知识界和文学界的共识。“新启蒙”的夭折以及“纯文学”在90年代以后的危机，在许多论者那里归咎于知识分子和文学处理现实问题的能力。在我看来，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因为，当代中国历史中的问题显然不是用“专制主义”能够简单表述清楚的，当我们把“新启蒙”或者“纯文学”的出发点局限在反抗专制主义及相关方面时，尽管这个出发点是必要与合理的，但已经出现了疏忽当代历史复杂性的危险，出现了疏忽社会主义文化复杂性的危险；疏忽了这些复杂性，“批判的话语文化”无疑在形成之时就有诸多先天不足。

我们应当记得，“新启蒙”和“纯文学”即便在80年代也曾和现实构成过紧张的关系。蔡翔直截了当地说出了另外一个“80年代”：“20世纪80年代并不仅仅是一个浪漫的充满激情的时代，相反思想斗争乃至政治斗争仍然存在，有时候，这种斗争甚至显得非常残酷。”在这个紧张的关系中，当年“纯文学”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们，现在也坦陈“去政治化”背后的策略考虑，一些研究者把这种策略看成是以一种“政治化”的方式“去政治化”。如张旭东所言：“具